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时代的困境 与 不屈的探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陈学明 著

Karl Marx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时代的困境 与 不屈的探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陈学明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 / 陈学明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7-81129-002-8

I. 时… II. 陈…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763 号

丛书策划 李小娟
责任编辑 张爱华
封面设计 咸泽寿
责任校对 董丽洁

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

SHIDAI DE KUNJING YU BUQU DE TANSUO

陈学明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30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29-002-8/B·3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陈学明，男，1947年3月生，上海崇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陈学明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出版论著、译著近三十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总 序

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因此而改变。回顾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两条大致清晰的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推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直受到世界思想界的关注和重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理论挑战和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回顾20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贯穿整个世纪的现象,并由此形成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面临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的受挫、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文化危机,一批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应运而生: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等人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实

2 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

验为背景,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判流派,以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实践的学说具有任何其他理论都难以比拟的开放性和历史穿透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代表人物进入迟暮之年,特别是随着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相继逝世,人们原本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批判运动即将成为“告一段落”的历史。然而,历史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图景:不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施密特、沙夫、科拉科夫斯基、赫勒、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一直活跃到世纪之交,而且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批判现存社会,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提出了挑战。一些偏激的人士,如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这些变化,断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成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进程又一次坚定地展开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减弱,反而有增无减。从1995年到2004年,在巴黎举行了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纽约、伦敦、图宾根、加利福尼亚等地,也相继召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1999年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都名列榜首。世纪之交,不仅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样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依旧活跃,而且,德里达、杰姆逊

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纷纷“走近马克思”，从不同方面阐释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作出的“不能没有马克思”和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影响力。

我一直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而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一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不断变化。然而，无论是其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分析，还是关于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其关于暴力革命、政党策略、欧洲革命、东方社会特征的分析，还是关于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无论是其关于唯物史观原理的阐释，还是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等方法论的探讨，在深层次上都服从于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关切：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体现哲学本性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奠基在人的实践内在具有的不断超越、不断扬弃异化的批判本性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等在内的许多当代思想家所敬重，他的学说的价值绝不会为我们的时代所穷尽。

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的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正源自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我们看到，无论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主题、问题域、范式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异，无论它们在重新阐释和张扬马克思的思想时存在多少误读和偏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像马克思一样，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类的命运；它们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学说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境遇，探寻新的革命变革的思路，以深刻的方式切入20世纪人类生存的焦点问题，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野。

正因为如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实践意义和指向。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表面看，涉及

4 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

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在多维视野中对于这些理论观点的评价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注热情更多地是这些理论的现实“所指”。我们是以折射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直接的理论反思。因此,当代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专业人士往往是通过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来深刻理解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他们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而言,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而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一定是同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说来,在全球化背景中,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20世纪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擦肩而过。毫无疑问,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流派时,忽视它们的局限性、失误和理论错误,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倾向;然而,不去认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启示,同样是

不能容许的褊狭和封闭。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05年11月25日举行的第26次集体学习,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题,专门了解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西方国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流派”。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翻译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单独立,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理论热点。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此,在为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就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作了讲解之后,我一直考虑以某种方式来推进这种回顾和总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是几位中青年学者过去十几年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成果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当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范式、理论评价、推陈出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某些理论失误。正因如此,适时地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清醒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具有特别的意义,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同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

袁俊卿

2007年11月15日

序 言

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之机,我想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与总结一下自己近30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由于想说的话实在太多,我打算主要围绕着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目前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这两个问题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文革“动乱”结束,我与许多处于“迷惘”中的年轻人一样,急急忙忙地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以使自己的一生能安定下来。我是个大学教师,是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关键是要选择好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决定选择“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选择,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具体地说,我是为了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躲”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小天地”之中的。我自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者是如此的陌生,距离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现实又是如此的遥远,自己可以非常“安全”地在这个领域里自得其乐。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自

己的这一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我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呢？难道仅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吗？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实际上，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人类关怀和现实关怀；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不是为了使自己回避而是应更好地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要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所建树，就绝不能仅仅把此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当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如果哪位读者愿按照时间顺序留意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文章，一定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文章的“纯学术”色彩越来越淡薄，而代之以力图开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而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的强烈意向。

正因为当时我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开始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确实也走了一段弯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只是热衷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甚至是某一代表人物的某一著作、某些理论观点的引介和剖析，而不是立足于从整体上去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可能对这一代表人物，这一代表人物的某一著作、某些理论观点应付裕如、彰明较著，但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依然不明不白、如坐云雾，甚至还会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错误。后来我意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整体性的研究，即着眼于通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局和基本学术取向，即使是对个别代表人物，个别代表人物的个别著作、个别理论观点的研究，也必须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中来加以剖析。

其二，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刚开始时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把前者视为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圈子”内你显得满腹经纶、自成一家，但“圈子”之外的人则完全可以对你不屑一顾、兴味索然。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

严重的挑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有多少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瞄准这些重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鉴于自己吸取了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训,我终于在学界率先发出了“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的呼唤。

其三,只是按照流派、人物和著作这一顺序“循规蹈矩”地进行研究,而不是以问题为切入口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以流派、人物、著作入手加以考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刚开始时我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发现这种研究作为一种“初级阶段”的研究或许有它的价值,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启示”这样一个研究目标。于是我向自己提出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的要求,即以问题为切入口,在浩如烟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著作和理论观点中,紧紧抓住一个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确实有着重大创见,并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其四,只是停留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一般性的介绍上,而不是注重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价值评价。当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之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著作,以及一些基本思想介绍进来,是完全必要的,也确实曾经受到了欢迎。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但后来我知道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其职责决不仅仅在于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要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我深深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难度,不仅仅在于通过阅读他们的外文原著,了解他们的思想,并正确地用中文把其表述出来,更在于如何运用正确的判断标准,对这些思想的是非曲直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改变,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所改进。实际上,我是带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与“框框”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这些“成见”与“框框”主要来自

于当时能读到的国内外的一些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是首先通过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而是主要借助于这些“第二手”的资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佩里·安德森的这一著作尽管篇幅不大,但思想容量极大,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对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烂熟于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主要是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眼光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通过不断地调整与端正自己的研究态度与方法,我才慢慢地从佩里·安德森的“成见”与“框框”中走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了以下若干变化。

其一,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做一种与带引号的“左”联系在一起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由于佩里·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左倾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加上这一思潮在上世纪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中也确实被“新左派”利用过,再加上作为这一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的思想刚一露头时确实曾被列宁批评为“‘左’得很、坏得很”,所以在我的脑海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与带引号的“左”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经过“心平气和”地潜心研究,逐渐认识到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戴上这样一顶“帽子”是非常不合适的。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截然有别的一种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它是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中的一种,是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中的一种,它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其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由于各种原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远逊于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事实明确地告诉我,草率地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戴上一顶“‘左’倾激进主义”的“帽子”而又简单地加以否定,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不相符,又严重地影响着研究的成果。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摆脱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先入为主的“成见”的过程。

其二,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做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经

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前我顺着佩里·安德森的思路,抓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关在高楼深院里的学者、教授这一点大做文章,对其“脱离实际”和“经院性”大加鞭挞。后来我认识到这样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太穿凿附会了,甚至还有点“指鹿为马”。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身份和他们表述理论的方式而言,这一思潮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然而,只要我们留心注意一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就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着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 and 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我这样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隐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的珍品一下子显现在我的面前。

其三,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做一种局限于哲学和美学领域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断言,马克思主义研究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其主题已发生了转换,即从经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哲学、美学领域。佩里·安德森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认定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其力量也在哲学,从而他们能致力于的也就是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于,佩里·安德森的这一判断会把人们引向两个极端的认识:一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局限于哲学领域,对其他领域则毫无顾及;二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孤立地研究哲学,而并不是把对哲学的研究与对其他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我本人长期以来正是持有这样两个极端的认识。后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整体”研究的启发,认识到既然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整体”的研究,就意味着他们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除了哲学与美学的领域之外还有着其他的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关键在于他们要求不能孤立地在各个领域从事研究,而应把各个领域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后我就尝试着按照这一新的认识去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收获。

其四,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做一种热衷于把现代西方

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调和、折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把注重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的结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特征。我曾从佩里·安德森的这一说法引申出去,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搞“折中”、“调和”。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不能这样简单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结合在一起、用现代西方思潮之“长”补充马克思主义之“短”的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有着十分卓越的见解。他们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而且在整体上也胜过现代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向现代西方思潮,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开放”,吸收其一切优秀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如果把他们的那些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新实证主义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放到他们的这样一种认识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就不可能对之给予全盘否定,并横加指责。最近几年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吸收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来发展自身,而现代西方思潮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认识出发,去重新估计佩里·安德森所归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征的。

其五,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做一种致力于破坏和否定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有双重含义:一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二是说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文明,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佩里·安德森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的研究者还常常把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以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问题在于,我们又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批判性”与“消极性”扯在一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否定一切的立场,从而他们尽管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始终拿不出一套如何改变这一社会的建设性方案,从而他们的这种批判与否定从根本上说是“消极”的。后来我认识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方

面;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有没有提出如何改变这一社会以及有没有设想过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通读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著作,我们只能对前一个问题持否定的回答,而对后一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笼统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其所谓的“批判性”必须加以重新认识。

其六,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做一种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现代西方特有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只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贯穿于其理论发展始终的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不是只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只对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有启发作用?这涉及到当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何在以及有多大的意义这一更重要的问题。我原先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十分模糊。我受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背景的论述影响很大,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国家还处于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现代化的弊端所展开的批判,对我们国家并不适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会干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后来通过研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通过探索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终于认识到这样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于是我在各种场合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之所在。我的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之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批判的宗旨是希望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觉地趋利避害,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硕果,另一方面把现代化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中国人民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获得启示:西方的现代化事业出了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时间不长但同样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那样,正视并

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不能对之熟视无睹。

上述六个方面是我在这近 30 年的时间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主要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收获。这些变化的形成,这些收获的取得,一方面充满了痛苦和艰辛,另一方面又洋溢着快乐和幸福。每当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我就感觉我进入到了一种更高的理论境界。

最后,我还想就我的这部论文集讲几句。收集在这部论文集里的论文是我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所撰写的。2001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2006 年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我的论文集《永远的马克思》。我在这段时间里所撰写的论文有一些已被这两部教材和论文集所收集,而在这里所收集的这些论文是那部教材和那本论文集未收集的。之所以把这部论文集起名为《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是为了表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视时代的困境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的赞赏和敬意。

在近 30 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我一直受到了许多亲朋好友、同事同行的热情鼓励。没有他们的帮助,不要说我能在这一领域中取得一些成果,就是能不能坚持下来都是一个问题。这次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衣俊卿教授领衔推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邀请我加盟,要我提供一部书稿,这当然也是对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肯定与支持。我对衣俊卿教授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如古人所咏叹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了解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良苦用心,他们会不断地对我的研究成果提出中肯的批评与建议,促使我在有生之年坚持不懈地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

陈学明

2007 年仲秋识于复旦大学